

無視世界史和一葉障目的觀點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主席

回歸近14年以來，港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國家的迅速發展，以及香港社會意識到香港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密不可分，是香港國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礎。香港與內地愈來愈密切的經濟和人文關係，實際上已極大地推進了香港的國民教育。將國民教育妖魔化的做法，是無視世界史和一葉障目的觀點，似乎思維仍然停留在殖民時代。

從郎朗彈奏《我的祖國》說起



談論國民教育是「健腦」，筆者想從一件事情說起。已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郎朗，在白宮歡迎胡錦濤主席的宴席上彈奏了一曲中國人熟悉的《我的祖國》。「民運人士」魏京生為此在美國到處告狀，告到奧巴馬和美國的媒體，污衊「《我的祖國》是中共反美歌曲和洗腦歌曲」，大有「皇帝不急太監急」的味道，但美國人並不買帳。美國華人則直斥魏京生「腦殘」，批評他為得到賞賜竟然扭曲人類對國家民族的正常感情。實際上，劉熾作曲的《我的祖國》，與斯塔那的《我的祖國》、西貝柳斯的《芬蘭頌交響詩》、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穆索爾斯基的《伯里斯·戈都諾夫》等，都是抒發熱愛祖國和故鄉的感情，都得到全人類的認同和讚賞。郎朗就表示：「演奏《我的祖國》只為表達對祖國的濃烈情感。」此事說明，一個健全的頭腦，絕不會認為熱愛祖國和故鄉是所謂「洗腦」，只有像魏京生那樣「腦殘」的人，才把《我的祖國》污衊為「洗腦歌曲」。

國民教育是國際常用的「健腦」慣例

香港部分政治人物抹黑國民教育不合情理，也忽視了德育及國民教育制度是國際常用的「健腦」慣例。美國推廣國民教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例子，這與美國系統完善、注重效果、潛移默化、無孔不入的國民教育密切相關。在美國的中小學校裡，國歌、國歌、總統畫像這些美國國家的象徵物，到處可見。新加坡也十分重視國民教育，新加坡每年都要開展一次「國家意識周」活動，來凝聚國民的國家意識。在韓國的各類學校裡，愛國主義教育都是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學生從小到大就被告知韓國有哪些值得驕傲的地方，培養學生對國家的熱愛和認同感。

不應妖魔化國民教育

香港回歸前，殖民統治政府是不可能推行國民教育的。



政府計劃在全港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圖為中學上課情況。

1951年，港英公布的《菲莎報告書》赤裸裸地寫道：「鑒於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香港政府應把握一種義務和一個機會，以便向香港學生提供一些基本教育，包括一些基督教知識以及英國人的理想和習俗。港英當局根據該報告書提出的基本政策，於1952年大幅度修改教育條例和教育則例，禁止學校舉行「政治活動」，實際上是要遏制學校的愛國教育，強化殖民奴化教育。」

回歸後，特區政府想推行國民教育，但是阻力重重，原因是香港部分政治人物不認同祖國，不認同內地的社會制度。這些人妖魔化國民教育，認為國民教育是「洗腦」工作。其實，香港在殖民統治下，極其重視「英式國民教育」，實際上就是殖民奴化教育。香港部分政治人物的雙重標準是站不住腳的。

香港部分政治人物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其理由是指內地社會存在一些負面現象，這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內地現在處於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第一次現代化階段，其主要特徵是黃金發展期和問題突顯期。所謂問題突顯期，是指由於社會的飛速發展，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濃縮了西方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階段，所以，內地貧富差距、貪腐、司法公正、環保、社會保障等各種問題積聚式地爆發。但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社會的進步舉世讚揚，這是主流，負面現象只是問題突顯期出現的問題。

內地解決社會問題需要一定時間

實際上，在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充滿血腥和野蠻、無恥和厚黑，諸如強迫勞動、圈地運動、獵奴與海盜行為、憑權勢強佔公產、貪腐、種族歧視等，令人觸目驚心。從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罪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文明建設，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例如美國的種族歧視現在仍然根深蒂固，美國黑人權利活動家馬丁·路德·金40多年前說：「我夢想有一天，我的4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裡生活……」當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時，美國輿論曾談論美國是否已經進入了「後種族主義」時代，但多數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美國現實生活裡的種族歧視仍然是無處不在。

香港部分政治人物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其理由是指內地社會存在一些負面現象，這是無視世界歷史發展的看法，也是一葉障目的觀點。香港當年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歷了100多年，美國類似的問題也經歷了大致100年。而內地那麼大，人口那麼多，解決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會像美國那樣長，但也要有一定的時間。

況且，內地的文明質素和法治建設在穩步提高和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構建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求、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範，深入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筆者相信，內地社會存在一些負面現象，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是會逐步解決的。因此，以內地社會存在一些負面現象將國民教育妖魔化，是無視世界史和一葉障目的觀點。

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雙手戴銬被五名警察押送法庭的畫面震驚了法國。法國與美國在法律上存在着相當大的區別。如果此事發生在法國，當出現類似指控時，法庭將指定一名預審法官來對被指控的罪行進行調查，然後決定是否對被指控的嫌疑人提出司法起訴。在此期間，被告人受到「無罪推定」的保護，將不會失去自由，因此類似的畫面是不會出現在法國的。而在美國，只要控方有指控證據，並提出一定的罪證，雙方對質後，法官就能夠接受指控並關押嫌疑人。無罪證據將由被控方提供。正是由於這一差異，斯特勞斯-卡恩從被指控的一刻起，就遭到美國警方的追捕、關押。這在美國非常「正常」，而在法國，則對輿論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很多政治學家都認為，從這一畫面傳到法國後，斯特勞斯-卡恩的「總統夢」將永遠不再可能實現了。但卡恩的支持者並沒有放下武器。從此事發生的第一刻始，「陰謀論」就在法國盛傳。所有的矛頭都指向右翼執政黨「法蘭西公民聯盟」的一位年輕黨員。

根據報道，第一間披露卡恩被捕事件的，是一位名叫納坦，畢內的青年。他是「法蘭西公民聯盟」青年組織成員。他在上周六巴黎時間22時59分發出第一個「推特」信息，稱「我在美國的夥伴稱，卡恩可能因涉嫌性侵犯而在旅館被警方逮捕」。這時還沒有任何媒體發出這一信息。整整過了一個半小時以後，也就是巴黎時間23時30分，紐約郵報網站才發出第一條涉及卡恩的消息，稱「從紐約警方獲得的消息，當地時間下午16時45分，身穿便衣的紐約警方突然登上法航一架準備飛往法國的飛機，帶走了坐在頭等艙內的IMF總裁、法國政治家斯特勞斯-卡恩」。「陰謀論」都從中看出一個「巨大的破綻」：在畢內發出「推特」信息時，卡恩已經在飛機上，畢內在紐約的夥伴怎麼可能會「看到卡恩在飯店被捕」呢？法國「郵報」網站立即就此發表了一篇質疑文章，幾小時之內，文章點擊率超過11萬，卡恩被捕「陰謀論」於是立馬傳遍巴黎。

「陰謀論」還指控另外一名右翼執政黨「法蘭西公民聯盟」的年輕負責人阿爾諾，達西埃。他是法國總統薩科齊2007年大選時網絡助選的負責人。他在卡恩被捕的「推特」消息刊出後，第一個做出反應。「陰謀論」者指出，不久前斯特勞斯-卡恩在巴黎就曾爆出「保時捷」醜聞。當時一張卡恩夫婦正從一輛豪華型的「保時捷跑車」下車，被人偷拍到一張照片並發表出來。這張照片立即使輿論大嘩，選民質疑這位左翼總統候選人過着「奢華、腐敗」的生活。而支持卡恩的人發現，這張照片的來源，就是達西埃。兩者一聯繫起來，使法國左翼社會黨的部分黨員和部分輿論，認為卡恩性侵犯事件「一定是右翼設下的一個陷阱」。

事實上，是否相信「陰謀論」往往與事實或推論沒有太大關係，而與每個人對事件所採取的立場有關。當記者們到斯特勞斯-卡恩擔任市長的選區薩爾薩斯省採訪時，當地左翼民眾幾乎沒有人相信卡恩會試圖「強姦」。而在其他右翼民眾佔上風的地方，選民則幾乎罕口不一地認定，卡恩完全有可能做出類似的事件。

應該強調的一點，是卡恩作為法國左翼總統候選人的熱門人選，是有着非常複雜的背景的。斯特勞斯-卡恩是一位出生在摩洛哥，移民法國的猶太裔政治家，在法國有着眾多的政敵。在法國，一旦涉及猶太裔，事情往往會變得非常複雜。「陰謀論」也因此特別盛行。只不過指控方和受害方這一次似乎換了一個角色而已。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卡恩在「女性問題」上絕不是一個無可指責的人物。因此，這次的「陰謀論」儘管也從網絡侵入了傳統媒體的領域，但相信者似乎並不多。相反，今天法國媒體紛紛挖出卡恩過去的種種醜聞。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女記者、作家特麗斯塔娜·巴農對卡恩的指控。2007年巴農在一個專題電視節目裡就提到了此事。當時卡恩的名字被電視台「過濾」了。巴農的母親是社會黨地方選舉的候選人。出於競選考慮，其母不讓巴農對卡恩提出起訴。巴農與卡恩非常熟悉，她是卡恩前妻的教女，卡恩女兒的好朋友。巴農今天表示，她也正在考慮起訴卡恩。正所謂「禍不單行」啊！

卡恩「性侵犯案」：陰謀論再起

鄭若麟 資深評論員

李卓人公民黨聯手「靠害」打工仔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先有李卓人開天殺價，破壞勞資關係，製造大量低技術工人失業；再有公民黨利用司法覆核，阻停港珠澳大橋等基建工程，令3萬名建造業工友有失業之虞。反對派為了政治目的屢屢與打工仔作對，與社會利益作對，難怪最新的港大民調顯示反對派議員全線民望急挫。如果這些政治操作就是反對派的選舉策略，那他們恐怕是玩火自焚。

原定去年第3季動工、2016年底完工的港珠澳大橋，由於被公民黨幕後操作，被迫無限期押後工程。作為兩地經貿融合的主要基建，港珠澳大橋工程受阻，不但嚴重損害本港經濟發展，而且對打工仔的生計造成沉重打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日前指出，工程延誤令本有好轉的建造業失業問題更加劇，港珠澳大橋及沙中線工程本來可為業界創造多達3萬個就業機會，但由於公民黨發動「司法狙擊」，令兩項工程都要立即停工，迄今已有數千名工人開工無期，業內預料失業率將由目前的6.2%，推高至8至9%。再加上之前職工盟李卓人借飯鐘錢及有薪假向中小企僱主發難，導致企業叫苦連天，不少打工仔更因而被裁，顯示反對派為了政治不惜犧牲打工仔利益，行為已引起廣大市民反感，民望全線暴跌不是沒有原因。

阻礙大型基建 打爛打工仔飯碗

近年本港經濟持續改善，失業率也拾級而下，最新季度失業率更回落至3.4%，為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的最低點。不過，建造業的失業及開工不足率仍遠較其他行業為高。業界一直引頸以待的十大基建及其他基建工程，成為了改善建造業工人就業的最有效措施。過去反對派屢屢阻礙本港的大型基建，將所有大型基建一概標識為「大白象工程」，以拉倒基建視為打擊政府施政的工具。然而，社會估不到的是，港珠澳大橋這樣一條連反對派也認同其價值與意義的基建，公民黨也要來這一手，也要利用司法手段來推翻其環評制度，結果令到大橋工程不知何時才能重新動工，完全是罔顧社會利益，肆意打爛打工仔的飯碗。

事實上，單計港珠澳大橋及沙中線工程，就能為業界創造多達3萬個就業機會，當中還未計及其他相關行業的就業職位及經濟收益。更嚴重的是，由於以往的環評制度被公民黨推翻，意味所有的基建工程都可能面對違法的指控，屆時就要看公民黨看哪項基建不爽，隨手找來陳婆婆、李婆婆、黃婆婆，就可以申請法院再去看停工工程，對公民黨一班大狀而言只是舉手之勞。但結果卻令到不知多少基建被迫停工或阻延，受影響的工友相信比起預計的3萬人還要多。公民黨千方百計要阻撓跨境大型基建，就如不少評論指出，正暴露其「抗中反中」的「港獨」思維，但從選舉層面考慮，公民黨令基建繼續蹣跚，香港繼續空轉，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的民生問題及社會不穩，屆時公民黨等人就可將這些經濟民生問題通通歸咎於不民主、歸咎於反對派被排除在管治班子之外，於是就要發動更多市民對抗政府，為之後的選舉造勢，這就是公民黨「搞禍」香港，「靠害」打工仔的最大目的。

這邊廂公民黨全力拉倒基建，那邊廂職工盟李卓人，卻不斷製造勞資衝突。為什麼港大最新民調顯示李卓人的評分急跌？負責調查的學者指出是由於他在最低工資的取態令部分中產對他產生惡感，而李卓人自己也承認，社會上有人對他在最低工資上的取態有負面感覺，但辯稱自己只是無良僱主的代罪羔羊。最低工資的推行是勞方爭取多年的成果，現在正式推行勞工界的議員理應有利民望，豈會如李卓人般反過來插水式下滑。關鍵在於市民看到李卓人在最低工資一役根本不是幫打工仔，反而是視打工仔為棋子，將他們推向與僱主對抗，而李卓人就站在後面檢便宜。

李卓人挑動勞資矛盾

最低工資要推行成功，除了要確保基層市民的收入得到增長之外，更要保住企業的生存，保住良好的勞資關係，否則個個魚死網破，打工仔也是一無所得。然而，李卓人卻做了什麼？在最後關頭挑起飯鐘錢及有薪假的爭議，將正式推行的重要時間拿來鬥企業鬥僱主，一味標籤僱主「無良」，發動工人及傳媒去向他們施壓，強迫他們在時薪內加入飯鐘錢及有薪假，導致不少僱主明言要結業了事，部分沒有結業的也要裁員，被裁的僱員完全沒有分享到最低工資的好處，反而丟了工作。李卓人不理打工仔的真正利益，以出位吸引傳媒為務，一味唱高調，自己贏了曝光，打工仔卻輸掉工作。

勞資雙方在釐定最低工資時，本已存在默契，就是將飯鐘錢、有薪假等爭議交回各自解決，根據合約辦事，以免最低工資的討論爭持不下，最終才有了28元時薪的妥協。如果當初是將這兩者計入時薪之內，那何不乾脆將時薪定為33-34元，這樣豈不更加清楚？就是因為雙方存在默契，但李卓人為了做騷，為了挑動勞資矛盾，突然出來搞局，令最低工資實行再生波折，不少打工仔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中小企老闆反感李卓人不斷以工業行動施壓，中產也對這種民粹行為看不過眼，這是社會各界對李卓人反感的主因，而非如他所說什麼成了「代罪羔羊」。

且看黃毓民的「刁民力量」

美恩

看見報章上題為《借題發揮：黃毓民搶票再轟公民黨》的文章，還以為黃毓民突然良心發現，炮轟公民黨濫用司法程序，操控東涌綜援戶朱婆婆告政府，令港珠澳大橋受到拖延，但細看內文後，發現是筆者會錯意。

黃毓民之所以炮轟公民黨，原來是不滿公民黨支持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將大會主席可驅逐行為不檢議員的權力，延伸至各事務委員會主席。這是繼日前黃毓民在議會內大罵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自掘墳墓」之後的延續。

規管議員不檢行為，是市民主流意見，公民黨加入支持行列乃是正常不過，始終公民黨不能次次都與民為敵，但黃毓民還是借故刁難，根本是無理取鬧，擔心在新制之下屢屢被逐出議會。

為狙擊而生存的「刁民力量」，恍如一條寄生蟲，寄生蟲將一生的大多數時間居住在另外一種動物之上，而「刁民力量」亦將一生的精神寄託放在狙擊之上，為狙擊而生存，彼此有着異曲同工之「爛」。惟一個政黨四圍樹敵，只懂狙擊，欠缺個性；說話只有power（聲量噪音），但無point（缺乏理據），市民會認同？

公民黨濫用司法程序，令港珠澳大橋工程嚴重受阻，亦令香港損失更多公帑，各方面都應該加以譴責，惟「刁民力量」卻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反而在《議事規則》方面作「垂死掙扎」，並且借機攫取政治金錢，試圖在公民黨手上搶奪票源。從今次事件看，香港市民應該清楚明白，「刁民力量」真正在乎的，並不是香港的整體利益，而是選票。

反對派三百人出選策略何在？

徐庶

11月的區議會選舉，反對派準備派出三百人參選。換句話說，建制派將有兩百多個選區遇到了反對派的進攻。這種局面的出現，與區議會與立法會是一個連環套有莫大關係，將來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候選人，必須是現任區議員。此外，如果反對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增加票源，將來在立法會選舉就會有更廣泛的選民基礎，反對派的目標，是要拿下三個「超級區議會議席」。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議員，如果取得了六十萬選票，認受性就遠遠超過分區直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他們就可以宣稱自己是票王，在政治事務方面更加聲大夾惡。

不過，要成為「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候選人並不容易，就是要先在11月當上區會議員，繼而有15個現任的區議員提名，才可以成為候選人。反對派明星靠政治爭拗起家，平日不肯到地區做群眾工作，提供地區服務，街坊對這些大明星「四年一度燕歸來」的政治現象非常不滿。因為他們平時一切都交給助理處理，街坊根本找不到這些大明星，但是到了選舉月份，就可以看到他們表演大騷，不斷地派單張，到酒樓和街坊握手，堆起了微笑。當選之後，謝票也沒有，揚長而去，睇你都傻。這是「一闖就變臉，有求於人忙賠笑臉」。反對派的立法會明星議員對於降格參加區議會選舉，實在沒有信心，因為難度比

選立法會分區直選更大。迄今為止，那些超級明星特別是公民黨的大狀，都不敢公開自己會到什麼地區參選。民主黨的李永達和何俊仁，則因為社民連、「人民力量」的狙擊而不敢表態。

所以，反對派採取了增加參選人數的策略，出動三百人出戰。這是擾敵、疲敵之計。一些反對派參選人，勝望不高，為何仍要以密集式海戰術出擊？第一，他們的選舉可用作政黨的宣傳，街掛掛在繁盛馬路，間接增加該黨政治明星的宣傳。第二，使建制派差不多每個選區都遇上挑戰，不能自動當選，更不可能到其他選區為黨友助選。在選舉論壇上，這些明知選不上的人，就會不顧形象，以砲灰姿態集中火力和時間，以許多「右譜」和不實言論攻擊建制派候選人，抹黑對手政黨。第三，派人參選，可以為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收集及開拓更多票源。社民連、「人民力量」派人參選，也是為了籠票，不讓其粉絲轉為支持民主黨，增加他們在下次選舉中討價還價的籌碼。

這一次，反對派會起用更多社工、在外國留學回港但未有工作的留學生、街頭憤青、議員助理出擊，正因此如此，一些參選人在最近的街頭暴力事件中，特別搏殺，特別出位，博上電視，希望增加知名度，為幾個月後的區議會選舉作宣傳。曾為梁家傑助選的骨幹曾建鋒，就是這樣出鋒頭，準備參選。